

粤港澳大湾区新型大学的战略需求与实践路径^①

姚宇华

(东莞理工学院,广东 东莞 523808)

摘 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是党和国家推动“一国两制”事业发展和服务新发展格局的重大战略部署。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新型大学有利于服务支撑区域高质量发展、推动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和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大湾区新型大学是指立足大湾区科技产业创新发展需求、在政府大力推动和支持下,通过学科专业、组织架构、人才培养模式、体制机制等系统变革而构建的具有新理念、新使命和新形态的新型高校。当前,大湾区新型大学发展存在办学经费来源渠道过于单一、科产教融合深度与广度有待拓展和治理现代化整体水平不高等困境。面向未来发展,大湾区新型大学亟须推进科产教深度融合,树立办学新理念;强化跨界交叉整合,构建学科专业新结构;深化教育教学改革,打造人才培养新模式;集聚多方优质资源,健全资源配置新机制及提升治理现代化水平,构筑治理新格局。

关键词:粤港澳大湾区;新型大学;高质量发展;科产教融合;治理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5485(2023)05-0033-10

DOI:10.16697/j.1674-5485.2023.05.004

粤港澳大湾区(以下简称“大湾区”)是党中央、国务院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开放,推动“一国两制”事业发展和服务新发展格局的重大战略部署,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引领示范作用。新时代,大湾区在高等教育领域以新机制新模式创办一批新型大学,办学成效初显,是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实践的有益探索。与蓬勃发展的办学实践相比,当前新型大学的理论研究尚较为滞后,主要表现在对于新型大学概念的变革历

程、内涵实质、建设路径等问题的探讨较为零散、系统性不够,从而不利于新型大学的未来改革发展。本研究聚焦大湾区新型大学的内涵与战略需求问题,结合已有发展实际提出参考性发展路径与建议。

一、粤港澳大湾区新型大学的内涵与特征

(一)大湾区新型大学概念沿革

纵观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历程,大学自产生以

收稿日期:2022-10-20

①基金项目:广东省普通高校青年创新人才类项目(人文社科)“知识生产模式转型视域下高水平大学建设研究”(2018WQNCX183);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三五”规划2020年度一般项目“面向新工业革命的中国新型大学建设研究”(GD20CJY29)。

作者简介:姚宇华,东莞理工学院高等教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博士。

来,其发展史就是一部持续变革史和创新史。在此过程中,世界高等教育中心经历了四次转移,意大利、英国、法国、德国、美国先后成为世界高等教育中心。在每一次转移中,都产生了一批引领世界高等教育变革的新型大学。改革开放至今,大湾区新型大学的发展可划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1978—2016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战略,高等教育改革遵循市场导向战略,产生了一批多类型多层次的新型大学。^[1]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广东部分经济实力较强的中心城市陆续创办了11所大学。由于举办及管理体制具有较大的创新性,被誉为中国的“新大学运动”。1999年,我国实施高教扩招政策,创办了一大批“新建本科院校”。这些院校以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为使命。2015年,教育部发布《新型大学新成就——百所新建院校合格评估绩效报告》,首次提出“新型大学”概念。同期,以深圳为代表的部分城市,在积极创办本土新型大学的同时,大力实施“招院引校”政策,吸引国(境)外及国内高水平大学到当地采取异地化、中外合作等形式创建新型大学。如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南方科技大学、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等。

第二阶段为2017年至今。党的十九大以来,“建设现代化强国”成为国家发展战略。建设现代化强国需形成以“区域知识创新中心”为目的的地方高校体系。^[2]201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以下简称《纲要》),提出“支持粤港澳高校合作办学……支持大湾区建设国际教育示范区,引进世界知名大学和特色学院。”2020年,大湾区获批成为第四个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同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科学家座谈会上指出:“要加强高校基础研究,布局建设前沿科学中心,发展新型研究型大学。”以此为契机,大湾区大力推进新型研究型大学建设。一是以新机制新模式布局建设大湾区大学等高水平研究型大学;二是与香港地区一流研究型大学合作办学。如创建香港科技大学(广州)、香港城市大学(东莞)等。

与此同时,广东省还高度重视其他类型高校的创新改革与转型发展,2015年起在全国率先实施“双高”建设,推动各类高校创新发展。如支持以东莞理工学院为代表的地方应用型大学建设成为新型高水平理工科大学。“建设一批新型高水平理工科大学”被列为新工科《北京指南》、“九个一批”示范成果之一。

(二)新型大学理论研究概述

与新型大学相似的概念有新兴大学、创新型大学、创业型大学等。不同学者基于不同视角,对其内涵进行了探讨。

20世纪90年代,有学者对广东中心城市办大学的现象进行了深入研究,将这批新建的大学称为“新兴大学”。^[3]进入21世纪后,随着世界部分建校时间较短的新兴研究型大学崛起,引发高等教育领域学者的广泛关注。如2016年在麻省理工学院召开了一次汇集世界九所顶尖新兴大学校长和一批高等教育领域知名学者的会议,对新兴研究型大学发展的相关理论问题进行了探讨。^[4]

创新型大学与创业型大学的内涵具有一定的差异。伯顿·克拉克在解释其选择“创业型”而非“创新型”概念的原因之中时指出:“创新型大学”不是一个内涵清晰、有明确定义的学术概念,而“创业型大学”在办学理念上,强调的不仅仅是创新,更为强调“创新创业”是学校的灵魂和核心竞争力。在中国语境下,创新型大学外延更为广泛,包括推动组织变革、强调科技创新等突出“新”特征的所有大学。^[5]

新型大学最初特指1999年以来新建的以本科教育为主,面向区域经济社会,以学科为依托,以应用型专业教育为基础,以社会人才需求为导向,培养高层次应用型人才的新型院校。^[6]2012年,随着南方科技大学等一批以新机制、高起点新型研究型大学的创办为代表以及建设新型研究型大学确立为国家的重大政策以来,新型研究型大学成为理论研究关注的重点问题。

(三)大湾区新型大学的基本特征

有学者将新型大学内涵概括为十个新。^[7]已有研究成果为阐释大湾区新型大学内涵提供了有益

参考。为进一步分析大湾区新型大学的内涵本质,本研究选取大湾区内的香港科技大学、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南方科技大学、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学、东莞理工学院、香港科技大学(广州)、深圳理工大学和大湾区大学等8所具有代表性的新型大学作为案例,通过文献资料查阅、调研、访谈等方式对其关键性要素进行描述性分析,总结出大湾区新型大学的基本特征。

一是高起点和高水平的办学定位。20世纪90年代以来,大湾区的香港地区借助其高等教育办学体制相对灵活等优势,相继创建了以香港科技大学为代表的一批新型大学,这些大学在办学定位上具有高起点和高水平的特点。作为一所致力于重点关注科技,旨在推动香港地区向知识型经济转型的新型大学,香港科技大学自创办之初,明确将办学目标定位为:“成为一所以科学、技术、商业和管理为主,辅以人文和社会科学的世界一流研究型大学。”同时,深圳在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的背景下,利用特区政策优势,一方面创办了本土新型高校——南方科技大学,明确提出要“加快建成国际化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创造国际一流学术成果,推动科技应用,支撑国家、广东及深圳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通过中外合作办学方式,引进国内外优质高等教育资源,尤其是加强与香港一流大学的合作办学,新建了多所新型大学。如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提出要“成为区域、全国及国际公认的一流研究型大学,在中英文双语及全球视野的教育教学、学术成果及社会贡献诸方面,均达到卓越水准”。自大湾区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以来,除深圳外,广州、东莞等城市也加大了高水平新型大学的建设力度。如东莞理工学院以国家、省市大力支持建设新型高水平理工科大学为契机,在新时期将办学定位调整为“加快建成具有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国内一流、代表东莞形象的新型高水平理工科大学示范校”。正加快推进筹建的大湾区大学更是提出要“办成一所独具特色、引领未来科技发展、产业升级和社会进步的新型研究型大学”。

二是学科专业设置紧密对接区域科技产业创新发展需求。作为新型高等教育机构,新型大学在学科专业设置上充分发挥其后发优势,聚焦国家及区域重大战略需求,结合自身办学实际,瞄准区域科技产业发展前沿,动态调整学科专业结构,不断开辟发展的新领域、新赛道。第一,坚持“小而精”原则,集中优势资源布局建设支撑引领国家及区域发展的特色学科专业。从各新型高校设置的专业情况看,大部分专业均与当前大湾区新兴战略性产业密切相关,如生命科学、先进材料、人工智能、新能源科学与工程、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脑科学、机器人工程等。以此为基础,大部分高校设置的二级学院数量较少,一般在4~8个。第二,从学科专业门类看,新型大学均侧重于理工科专业,辅以少量的应用性人文专业。第三,学科专业设置强化交叉融合,学院(系)设置坚持产业需求导向,趋于扁平化发展。如香港科技大学(广州)不设学院,组建了四个连接多个学科的枢纽,每个枢纽下设交叉学科性质的学域;推进筹建的大湾区大学拟打破传统的“大学—学院—学系”组织体系,代之以“大学—领域”扁平灵活的组织架构。

三是创新性的人才培养模式。大湾区创建新型大学的核心目标是为建设科创型湾区提供强有力的人才支撑。构建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提升人才自主培养能力成为各大学的核心使命。梳理8所大学的人才培养模式可以发现一些共性之处。第一,在人才培养目标上,大多定位为培养拔尖创新型高层次人才。如香港科技大学提出要通过“提供全面发展教育以促进未来成为各领域的领导者和终身学习者”;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则“致力于培养具有国际视野、中华传统和社会担当的创新型高层次人才”;东莞理工学院创办了国内首个“杨振宁创新班”,探索拔尖创新应用型人才培养。第二,通过创办书院推进和强化通识教育。如南方科技大学将书院制作为人才培养的核心和特色,设立了致仁、树仁、致诚、树德、致新、树礼6个书院;深圳理工大学创建了学院、书院、研究院“三位一体”的人才培养体系。第三,采用国际化、

个性化、小班化的教学方式。注重借鉴和采用国内外以国际化、个性化为特色的先进教学方式,如南方科技大学构建了“国际化、个性化、精英化”的教学模式;香港科技大学(广州)实施全面立体及多元学科融合的教学方式。第四,深化人才培养组织创新,构建科产教协同育人机制。如正在筹建的大湾区大学着力推进交叉融合跨学科课程建设,突出理论与实践相融合,实施“学校+大科学装置(科研机构)+龙头科技企业”的“科产教合作育人”机制;东莞理工学院以建设现代产业学院为抓手,深入推进新工科产教协同育人。

综上可知,大湾区新型大学是一个随着历史变迁、外部环境变化、研究主体和客体不同而富有“流动性”的概念,是现实性与可能性、客观性与主观性、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的统一。大湾区新型大学不应作为一个已成型、维度清晰和静态的现实存在物,而应既是被主观认识的客观世界,又是一个不受经验性法则侵蚀的价值无涉的客观存在。^[8]据此,本研究将大湾区新型大学界定为:所谓大湾区新型大学,是指立足大湾区科技产业创新发展需求,在政府大力推动和支持下,通过学科专业、组织架构、人才培养模式、体制机制等系统变革而构建的具有新理念、新使命、新形态的新型高校。从外延看,既包括各类通过改造升级面向产业和面向未来的传统大学,也涵盖按照创新设计而塑造的新建大学。

二、粤港澳大湾区新型大学的战略需求

从世界范围来看,国外一流湾区在全球经济中发挥着转型升级、引领创新和聚集辐射的核心驱动作用。国家布局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旨在从战略和区域经济层面发挥其构建新的空间引擎的重大使命。这对建设一批高水平的新型大学提出迫切需求。

(一)服务支撑区域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需求

根据经济学家提出的增长极理论,一个国家或区域的发展不会同时出现在所有地方,而是以不同强度首先出现在一些增长点或增长极上,这些增长点或增长极再通过不同渠道向外扩散,最

终辐射影响不同地方的经济发展。^[9]因此,推动区域发展成为政府和理论研究关注的重点。区域发展关注能促进一个区域经济体提升高水平竞争力和创新能力的地方性条件。这些条件包括土地、劳动力、资金等有形要素,也包括知识、社会资本、学习等无形要素。在不同时期,不同要素在经济发展中发挥的作用有一定的差异。随着全球经济步入知识经济时代,知识、人才等无形要素在区域发展中发挥着决定性作用,而无形要素的形成与高等教育发展密切相关。

就我国而言,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等是主要的经济增长极,承担着带动全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使命。大湾区建设是近年来我国实施的一项重大发展战略,具有良好的经济发展基础。但与国外一流湾区及国内其他经济发达区域相比,粤港澳高等教育与区域协同发展尚存在一定短板,其采取的是企业主导型模式,强调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创新资源的配置集中在创新活动的下游,主要依靠产教融合提升企业的自主研发能力。^[10]大学知识创新能力和高等教育整体质量有待提升。如2018年大湾区的国内生产总值(GDP)、高校总数及一流大学分别占全国的14%、7%和5%,而京津冀、长三角的相应占比分别为14%、10%、24%及23%、17%、19%。^[11]为此,大湾区发展必须将区域高等教育作为自身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大现有高校的改革创新力度,布局和建设一批新型大学,不断提升高等教育对区域科技产业创新的支撑力和贡献度。

(二)推动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核心需求

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又称全球科技创新中心,其兴起、更替和多极化,本质是由科技革命、制度创新、经济发展等多种因素的演变所决定的。当前对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内涵尚无统一的认识,2000年7月,美国《连线》杂志最早提出“全球科技创新中心”的概念。对于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概念的理解需要融入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深刻变化之中。所谓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指城市创新要素、创新主体、创新环境等创新资源突破国家界限,一些经济或科学

技术发展优势突出、区位优势明显的城市或城市群,成为国家创新网络枢纽节点,辐射和主导国际创新活动,支撑引领国家及区域发展。^[12]

《纲要》明确提出将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作为战略定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进一步提出:“支持北京、上海、粤港澳大湾区形成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北京怀柔、上海张江、粤港澳大湾区、安徽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建设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强化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经济技术开发区等创新功能。”自此,我国形成了由“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和国家级自主创新示范区及高新区等”组成的“由上而下”的“金字塔”形国家创新体系。2020年7月,深圳光明科学城与东莞松山湖科学城获批大湾区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先行启动区,成为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核心载体。众所周知,建设一流大学是推进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核心主体要素。为此,大湾区亟须建设一批高水平新型大学,发挥高校是科技第一生产力、人才第一资源、创新第一动力重要结合点的作用,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提供基础性、战略性支撑。

(三)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内在需求

“内涵式发展”作为一个发展理念,最初应用于经济发展领域,是指转变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的重要战略。此后,这一概念的内涵不断被丰富,逐步被运用到高等教育领域。“内涵式发展”是我国高等教育领域的一个本土性概念,其扩散路径为“从政策术语到学术话语”,具有深刻的实践意蕴。^[13]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作为高等教育发展的核心理念和关键目标任务,既要做到符合或反映高等教育学术性和教育性的一般性本质要求,同时也要符合或反映具体社会、文化背景下的高等教育特殊本质要求。^[14]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推进,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已经成为指导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核心理念。

改革开放以来,大湾区通过开展“新大学运动”、率先启动“双高”计划等举措,为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创新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和实践。同时与国外一流湾区相比,粤港澳大湾区高等教育类型、层次、学科专业结构等与产业结构仍存在耦合不够紧密等问题,大学整体水平无法完全支撑“科创型”湾区发展。对标国际一流湾区,应将推动和实现内涵式发展作为新型大学建设的基础性和战略性工程,着力打造区域高等教育高地,为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创新探路。

三、粤港澳大湾区新型大学发展当前面临的挑战

(一)办学经费来源渠道过于单一

与传统大学相比,新型大学的一个鲜明特点是投入规模大。与西方国家因捐资办学文化较为发达、高校办学经费来源多元相比,大湾区新型大学的办学经费渠道来源较为单一。在创校初期,除香港科技大学外,其他高校建设经费全部由地方政府承担。在办学过程中,大部分大学办学经费来自政府的财政拨款。根据各大学公开的数据,就建校经费而言,香港科技大学一期建设共花费了4.14亿美元,香港中文大学(深圳)一期建设、二期建设项目投入达35亿元,香港科技大学(广州)总投入为150余亿元,正在筹建的大湾区大学总投资估算约100亿元。从办学年度经费预算看,南方科技大学2021年预算收入407 311万元,其中政府预算拨款379 333万元,占总经费的93.1%;东莞理工学院2022年预算收入133 984万元,其中财政拨款103 984万元,占总经费的比例为77.6%。依据资源依赖理论,办学经费来源渠道过于单一可能对大湾区新型大学的可持续发展产生不利影响。主要表现在:一是新型大学通过巨额的资金投入可以在世界范围内招聘一流人才,在短时间内快速提升办学水平,但这种投入驱动的发展模式受外部经济发展环境的影响较大,经济增长下滑可能使持续性的高投入无法延续。二是办学经费对政府过于依赖,有可能削弱大学的办学自主性。

（二）科产教融合深度与广度有待拓展

科产教融合作为一个概念,具有较为丰富的内涵。从宏观层面看,包括科学技术体系、产业体系与高等教育体系;从微观层面看,“科”指科学研究和技术研发活动,“产”指具体的产品生产活动,“教”则指教育教学活动。在宏观层面,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加速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趋于一体化发展,高等教育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中发挥着支撑引领作用。在微观层面,高等教育的教育教学活动需聚焦科技产业创新发展需求。对照大湾区科创湾区的定位,当前大湾区科产教融合深度与广度还不够。一是科技、产业与高等教育耦合度不高。由于体制机制差异带来的合作瓶颈,大湾区内各城市在科技、产业、大学布局上,尚未形成合理的竞合关系。紧密对接科技产业创新集群的高等教育集群尚未形成,高等教育对区域科技产业创新的支撑度和贡献度亟待提高。二是科产教协同育人机制建设不完善。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的全面推进,大湾区集聚了一批大科学装置、一流科研平台和龙头科技企业等高端创新资源。但新型大学由于创建时间较短,科产教协同育人机制有待进一步完善,多主体协同育人的价值共识尚未形成、多元优质育人资源的整合仍面临较多组织壁垒。

（三）治理现代化整体水平不高

治理现代化的本质是通过尊重教育规律、坚持传统与国际化相统一,实现制度规划体系不断科学健全、决策权力配置不断优化、行动主体力量素质不断提升的过程,是保障新型大学持续发展的关键要素。^[15]从空间维度看,大湾区高等教育治理经历了全球治理、国家治理和湾区治理格局的发展阶段。湾区治理格局是在新形势下形成的区域高等教育协同治理形态,复杂性程度较高,为区域高等教育治理未来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16]对标高等教育治理格局的协同善治目标,当前大湾区新型大学治理现代化水平还不高。一是由于三地制度体系差异较大,区域高等教育协同治理体制尚未形成。如香港地区与广东合作创办的新型大学仍依据《中外合办大学条例》治理,制约和

影响了合作办学的深度。同时省级政府在统筹创办新型大学中的权力较为有限,导致区域高等教育协同发展能力不足。二是高校内部治理存在较强的封闭性,政府、行业、企业等外部主体及教师、学生等内部主体共同参与治理的广度和深度有待提升。

四、加快推进粤港澳大湾区新型大学建设的路径选择

从组织理论角度看,大学作为一个整体模型,可分为三个层面:一是制度层面,即宏观层次的“体制与结构”问题,开放性较强;二是管理层面,即中观层次的“组织与管理”问题,发挥着大学组织内部和外部环境的媒介作用;三是生产层面,即微观层次的“知识与课程”问题,相对较为封闭。^[17]为加快推进大湾区新型大学建设,构建支撑引领一流湾区的区域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系,新型大学建设应明确重点,从体制、管理及技术等方面进行突破。

（一）推进科产教深度融合,树立办学新理念

就内涵而言,大学办学理念与教育理念、大学理念等概念有一定的联系性,但也存在一定的区别,教育理念、大学理念是更为上位的概念。对于大学办学理念的定義,目前尚无统一的认识。对其内涵的理解,须把握以下三点:一是与教育理念、大学理念相比,大学办学理念更为侧重于对大学办学实践的指导;二是大学办学理念是一个历史性、社会性概念;三是大学办学理念具有共性和个性相统一的特征。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加速演进,大湾区新型大学面临的外部环境更为复杂多样,亟须通过推进产学研融合创新和科教融合,以创新性的办学理念构建科产教深度融合的湾区高等教育发展模式。

第一,“产学研创”理念。“产学研创”即产学研融合创新,是指在区域创新体系建设中,立足于以大学为主体的学术系统和以龙头企业为主体的产业系统互促共融,大学和企业分别发挥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的作用,政府作为推动集成创新的重要力量,再加上一些创新支持性群体,通过紧密合

作、互促共享,推动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有机融合,形成功能互补、价值整合的开放式创新系统。^[18]构建高水平区域创新体系是大湾区的关键目标,新型大学作为大湾区创新体系建设的主力军,应全面提升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能力,积极开展面向国家重大需求的科学研究,服务支撑区域高质量发展。

第二,“科教融合”理念。“科教融合”是指导世界高等教育变革和转型的一种重要理念。洪堡通过建立柏林大学,确立了教学与科研相统一的原则。19世纪下半叶,吉尔曼基于美国高等教育发展现实,对洪堡理念进行了创新性改革。20世纪末,欧内斯特·博耶进一步发展洪堡理念,提出了“教学即学术”理念,倡导让本科生参与科学研究,推动了“科研—教学—学习”联结体向本科教育的延伸。^[19]新型大学自创建之初,就拥有一流的师资队伍、高端的科研平台,肩负着培养高素质创新人才、探索科技前沿的使命。为此,应坚持科教融合理念,构建“科研—教学—学习”联结体,以学生发展为中心,充分发挥科研育人功能,以高质量的科学研究支撑高水平的创新人才培养。

(二)强化跨界交叉整合,构建学科专业新结构

学科是科学学概念,实质是一个知识体系。专业是社会学概念,指专门学业或职业。学科专业是大学开展各项活动的重要载体。大湾区作为一个科技资源丰富的区域,发展新经济成为核心发展任务。新经济是一个跨行业、跨领域的概念,其依托的学科具有典型的“交叉融合”特征,新经济的发展将会推动一批具有跨界特征的新兴学科的产生。与此同时,适应新经济发展的人才应具有交叉复合的特征,具备跨学科、跨产业的跨界整合能力。在学科专业建设上,大湾区新型大学应注重跨界交叉与整合。

第一,瞄准区域产业需求,主动布局新兴学科专业建设。以服务支撑大湾区产业技术创新发展作为逻辑起点,面向区域战略性新兴产业布局,注重学科专业设置前瞻性,积极设置前沿和紧缺学科专业,提前布局培养引领未来技术变革和产业

发展的人才。集中优质资源向服务大湾区主导产业和特色产业的学科专业汇聚,构建与大湾区新经济发展相适应、与学校办学定位和办学特色相匹配的学科专业体系。

第二,推动学科专业交叉融合,强化教学科研组织创新。在学科专业及教学科研组织设置上,突破传统的学科逻辑,更为注重产业需求逻辑。探索构建“大学—领域”等新型组织模式,减少大学组织架构层级,打破学科壁垒,推动学科交叉融合,促进专业教育、创新创业教育和通识教育有机融合,全面加强有组织科研,着力提升自主创新能力。

(三)深化教育教学改革,打造人才培养新模式

人才培养模式是指培养主体为了实现特定的人才培养目标,在一定教育理念指导和培养制度保障下,由若干要素构成的具有目的性、系统性、开放性等有关人才培养过程的理论模型和操作样式。^[20]新型大学建设的一个核心使命是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为“钱学森之问”寻找答案。

第一,转变教学范式。总体而言,大学主要有两种教学范式:一种为传统传授范式,又称为“老三中心”,即“教材为中心、教师为中心、教室为中心”;另一种为以学生为中心(SC)范式,又称为“新三中心”,即“以学生发展为中心、以学生学习为中心、以学习效果为中心”。^[21]世界范围内的一流新型大学莫不高度重视以学生为中心的范式,如引领世界工程教育变革的欧林工学院,在建校初期就邀请30名学生作为“欧林伙伴”(Olin Partners)参与学校的课程设计。实施“学生生活计划”,学校四年时间均聚焦于学生培养这一重大事项。^[22]大湾区新型大学应坚持整体思维和范式思维,协同推进学校各方面改革,深入贯彻落实以学生为中心理念,全面提升人才培养能力。

第二,推进学科专业课程一体化建设。大湾区新型大学在建设过程中,应坚持产业需求和跨界融合逻辑,大力推进学科专业课程一体化建设。集聚有限资源,确定对接区域新兴产业优先发展的学科领域,坚持以创业型学科为基础,推动一流

的创新性教学、一流学术研究和一流社会服务^[23]；建立专业动态调整机制，淡化专业，强化一流课程建设。

第三，大力推进科产教合作育人。大湾区在建设和发展过程中，形成一批“大学大院大平台”，汇聚了丰富的育人资源，为高校人才培养提供了优越的科技产业环境。新型大学在人才培养改革过程中，应加强与区域内各类创新主体合作，构建高效的科产教协同育人机制。

（四）集聚多方优质资源，健全资源配置新机制

高校资源是一个广义的概念，不仅包括资金、教师、设备等有形资源，也涉及制度、文化、价值观等非显性资源。长期以来，制约大学办学质量提升的一个重要因素是自身资源较为缺乏，外部优质资源囿于体制机制无法有效导入。新型大学自创建之初，就具有开放、共建和共享等特征，有利于集聚整合内外部优质资源。但不可否认，目前大湾区新型大学资源配置仍以国家中心模式为主，存在经费来源较为单一和资源在区域流动不够顺畅等问题。建议从以下两方面着手，健全资源配置新机制。

第一，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拓宽高校资源的来源渠道。借助大湾区新型大学办学体制相对灵活的优势，主动与区域内的高科技龙头企业、行业等多主体合作，走创业创新型大学发展之路，积极争取和引入外部主体的资金投入、先进设备技术、科研技术人才等资源，不断拓宽高校资源的来源渠道，逐步改变过去以政府投入为主的高校资源配置模式。

第二，构建资源共建共享机制。从资源禀赋角度看，不同主体拥有不同的资源优势。政府具有政策资源的导向优势，大学具有教育和公益性优势，企业具有技术研发和产品生产的市场化优势，科研院所拥有科技研发的优势。立足大湾区三地不同的资源禀赋优势，推动参与新型大学建设的多元主体构建责任共担、利益共享的资源配置机制，促进资源在区域内有效集聚和顺畅流动，助力新型大学高质量发展。

（五）提升治理现代化水平，构筑治理新格局

新型大学需要建设现代大学制度，促进教学、科研、服务社会等全方位变革。大学与企业相比，更易于满足现状，一般不愿意主动寻求改变，特别是这种改变有可能影响到个人角色及利益的改变。^[24]因此，通过创办新型大学模式，构建现代大学制度，能有效调动组织成员主动性。大湾区在建设新型大学过程中，应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优势，进一步完善现代大学制度，提升大学治理现代化水平。

第一，强化顶层设计，引导有序竞争。长期以来，由于受到体制机制等因素的阻碍，大湾区三地高等教育间合作较为松散。以推进大湾区建设为契机，中央、地方政府及教育主管部门应强化整体谋划，构建新型大学集群。依托区域新兴战略科技产业集群，在部分经济发达城市新建一批新型研究型大学；大力支持香港地区、澳门地区一流大学到广东办学；持续实施和推进新型高水平理工科大学建设，推动地方应用型高校改革创新。进一步发挥“集聚—溢出”效应，有力支撑湾区科技产业创新发展。

第二，推动组织试验，探索大学发展新模式。当前新型大学的组织形态与特征正在形成之中，远未定型。为有效推进组织变革，获得有效的组织知识，需从试验目标、评价标准、推动方式和试验规模等方面对新型大学建设进行组织试验。在试验目标上，聚焦当前高等教育中重大现实问题，尝试进行根本性突破的可能；在对试验结果评价上，采取包容审慎的态度，以获得有效的组织知识为导向；在推动方式上，更多鼓励高校自主推进；在试验规模上，适当扩大规模，支持不同类型层次高校参与。^[25]

第三，优化治理结构。大学治理分为外部治理和内部治理，内部治理的变革以外部治理的完善为基础。外部治理的主要问题是协调好政府和大学之间的关系。长期以来，大学往往是政府的附属机构，独立法人的地位不明显。政校不分、管办不分的治理体制造成责任机制不明确，大学办学缺乏自主权和积极性。大湾区新型大学具有多

样性,但都得到政府的大力支持。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应将制度优势转化为办学优势,构建政府与大学新型关系。如政府在经费方面大力支持新型大学建设的同时,赋予大学更多的办学自主权,探索负面清单管理模式。以评价改革为牵引,建立政府、社会等多主体参与的问责机制,更多关注科研成果的转移转化、实际应用和价值创造,提高第三方参与评价的实际效能。^[26]在内部治理方面,在坚持“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的基础上,建立决策权、监督权和执行权分立和制衡的治理架构。构建扁平化的组织结构,推动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由横向分权模式向纵向分权模式转变^[27],形成强有力的驾驭核心,不断激活“学术心脏地带”。

参考文献:

- [1][2]周光礼.构建中国特色高等教育体系:国家战略视角[J].中国高教研究,2020(07):5-13.
- [3]秦国柱.论广东新兴大学的基本特征[J].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1997(06):65-70.
- [4][22][24]菲利普·阿特巴赫,莉斯·瑞丝伯格,贾米尔·萨尔米,等.新兴研究型大学:理念与资源共筑学术卓越[M].张梦琪,王琪,译.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20:7-10、102-105、4.
- [5]付八军,宣勇.创业型大学建设的中国道路[J].高等教育研究,2019(03):40-45.
- [6]柳友荣.中国“新大学”:概念、延承与发展[J].教育研究,2012(01):75-80.
- [7]沈红.新型研究型大学,“新”在哪里?[J].复旦教育论坛,2021(06):5-7.
- [8]柳友荣,廖文秋.新型大学:“型”在何处[J].重庆高教研究,2017(04):17-29.
- [9]罗伯塔·卡佩罗.区域经济学[M].赵文,陈飞,等译.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14:195-196.
- [10]周光礼.区域发展的高等教育因素:概念框架与案例分析[J].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21(11):84-92.
- [11]王伯庆,韩蔚.粤港澳、京津冀、长三角地区高等教育与经济发展报告[R].深圳:南方科技大学粤港澳大湾区高等教育大数据研究中心,2020:3-10.
- [12]张士运,等.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战略研究[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21:12-13.
- [13]崔瑞霞,谢喆平,石中英.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概念来源、历史变迁与主要内涵[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19(12):1-9.
- [14]石中英.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理论要义与实践要求[J].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20(09):7-15.
- [15]王志强.孕育“中国新大学”:粤港澳大湾区国际高等教育示范区的实践路向[J].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20(12):20-27.
- [16]黄炳超,陈先哲.粤港澳大湾区高等教育治理的时空格局、形态嬗变及未来路向[J].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21(11):36-45.
- [17]周光礼.“双一流”建设的三重突破[J].大学教育科学,2016(04):4-14.
- [18]成洪波.粤港澳大湾区“产学研创”:内涵实质、需求背景与路径探索[J].中国高教研究,2018(10):36-40.
- [19]周光礼,马海泉.科教融合:高等教育理念的变革与创新[J].中国高教研究,2012(08):15-23.
- [20]董泽芳.高校人才培养模式的概念界定与要素解析[J].大学教育科学,2012(03):30-36.
- [21]赵炬明.论新中心:概念与历史:美国本科教学改革研究之一[J].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16(03):35-56.
- [23]黄志兵.创业型:“双一流”背景下新兴大学的一种战略选择[J].现代教育管理,2017(03):47-53.
- [25]贾永堂.组织试验与新型研究型大学的破与立[J].复旦教育论坛,2021(06):15-17.
- [26]李作章,倪晓丰.社会组织参与高职教育评价:正当性、限度及可行进路[J].职业技术教育,2023(01):53-59.
- [27]周光礼.中国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现状、问题与对策[J].中国高教研究,2014(09):16-25.

(责任编辑:李作章)

**Strategic Needs and Practice Path of The New University in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YAO Yuhua

(Donggu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Dongguan Guangdong 523808)

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is a major strategic plan of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and the State Council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ause of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and serve the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The construction of a new type of university in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will be beneficial to the service and support of high-quality regional development, the promotion of building international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center and the realization of the connotation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The new university of greater Bay Area refers to a new type of university with new ideas, new missions and new forms that are promoted and supported by the government through systematic reforms of disciplines,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talent training mode, system and mechanism, which are based on the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needs of th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dustry in the Greater Bay Area. At presen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ew universities in the Greater Bay Area is faced with difficulties such as the single source of funding, the limited depth and breadth of the integration of science, industry and education to be expanded, and the overall low level of governance modernization. In the future, it is urgent to establish a new idea of running a school by promoting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science, industry and education; construct a new structure of disciplines and specialties by strengthening cross-boundary and cross-integration; build a new mode of talent training by deepening reform of education and teaching, industry and education; improve new mechanisms for resource allocation by gathering high-quality resources from various sources and build a new pattern of governance by improving modernization level of governance.

Key words: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a new type of university;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ntegration of science, industry and education; modernization of governance